

克难成趣 为学日益

——我的求学教学治学经历与感悟

程方平

摘要：治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规划引领、学术耐心、自主判断、底线意识与现实观照的有机统一。在规划引领层面，强调根据个人禀赋与知识结构确定研究路径，有选择地深耕擅长的领域；在学术耐心方面，主张不急功近利、不追风逐潮，集腋成裘方成扎实之功；在自主判断上，要具备“当仁不让”的质疑精神和“只我是，无我非”的学术胆识，不盲从权威与时髦；在底线意识上，对学问存真诚敬畏之心，恪守学术规范，不以公权谋私名；在现实观照上，顾及研究的社会影响，不违学术良心，为教育改革与长远发展提供有益支持。治学路径应遵循“博—约—博”的递进法则，由通识奠基而专精一域，再以多学科支撑拓展学术视野，循环往复，层层递进。作为中国学人，须以读懂中国文字、深悟中国文化为本分，方能为己、为民、为国、为人类有所作为。

关键词：治学经验；学术自主；知行合一；博约递进

中图分类号：G7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6)02-0050-09

我的名字叫程方平，从不同的角度看，似乎都应该是学理科的，的确我在初中毕业前对文科并不感兴趣。可见，人到什么时候能正确选定自己一生从事的专业很难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因素会改变人的发展轨迹。个人能确定的只有坚定自己的志向并不断努力，在有机会会有条件时通过学习促进调整与改善。

我的父母（程明晔、张月华）都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当老师，父亲教政治理论；母亲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我出生前后，母亲通过夜大学习提高了知识水平，能较好地胜任图书馆外语阅览的指导和服务工作。父母及环境对我和妹妹的影响多是积极的，即便在“特殊时期”也没有根本改变。另外，北外也是一所很特殊的大学，不仅名家云集，还有一直以来的良好学习风气，不仅有晨读、晚读，校内和周边的爱学之人也常到图书馆读书。在北京高校中，北外的教工子女上大学和出国的比例均位列前茅。得益于母亲在图书馆工作，我从小常到图书馆看书和杂志，也常从图书馆借书来读。同院的朋友不仅经常转借传阅图书，也会在玩耍交流中相互学习。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发现比我小一岁的邻居李政已能看繁体字的《西游记》等名

作者简介：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著了，这激励我也尝试读一些有难度的书籍。在同龄人中，精于或醉心数学、历史、政治、外语、物理、体育等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或学者（陈大同、林青等都全球闻名）。起初，我很喜欢无线电、数学和体育，邻里的朋友也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爱好。受父亲的影响，我也涉猎书法、篆刻、绘画和一些体育锻炼项目，但当时都懵懵懂懂，好像一切都自然而然。

我的文科训练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在初中时写作文憋不出来，考作文仅写了两行半，40分的满分，老师给了20分，而且后来还把我收到朗诵组、板报组，为我后来转向文科奠定了一些浅浅的基础。初一之后，我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在北京市清河农场，是北京在天津的行政飞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参加劳动和学习。当地的清河中学给了我许多帮助和美好的回忆，老师同学的淳朴、真诚和尽心努力使我难忘。在那里，我很快就比较懂事了，并知道要自己努力和世事的艰难。1972年返京，我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学院（今名北京理工大学）附中上初三，已能在学习中找到不少乐趣，并考虑人生的发展问题。为了照顾有病的父母，也为了避免无希望上大学的尴尬，我听从了班主任老师孟繁琛的建议，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经学校推荐上了北京市第三师范学校，即首都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首师大”）初等教育学院前身之一，并在两年后回北京工业学院附中任教。上师范的经历很宝贵，虽然语文专业也不是我自己选的，但我喜欢的数理化已经没有名额了。当然在此之前，我还有其他选择，如学音体美，且当时我已得到画家韦启美的指点，曾跟武生裴宝元学过武术，跟书法家叶希豪学过书法，但因为当时音体美各科都是副科，且学习费用较高，所以只能将就学语文了。好在师范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和尽心，让我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不仅熟悉了语文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教学技能，掌握了一定的基础，还能在体育、美术、书法等方面坚持了自己的爱好，得到了书法家刘汉春、法制史专家林忠、教育家胡克英等一批优秀教师的指点。至今令我慨叹的是，当时的语文老师之一陈翼浦，曾在我的一次作文上批了四个字“像个论文”，似乎看透了我以后要做文史教育的研究工作。而陈老师不仅是逻辑学家和教育家，还是诸多侦探推理小说的作者。

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当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我是自知水平有限的，所以有时间便向老教师魏启学等求教，根据他们的指点弥补文字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欠缺。不仅抄写了《说文解字》《草字汇》《古代汉语》及《康熙字典》《古文观止》的部分内容，阅读了中外历史、文学史、文字史、书法史、思想史和一些文史古籍等，还知道要坚持阅读文史哲类的报刊，了解相关的研究流派和相应思想方法及动态。遇到难得的进修机会，我会一天高效阅读一两本书，并适时拜访过季镇淮、启功、吴组缃、陈叔亮、芦荻、袁良骏、裘锡圭、金开诚、张晋藩、程郁缀等文史大家。对于一些学生家长、邻居和师长等，我也有机会便求学问教，字词和计算机汉字专家林杏光、国际政治和外语学者张志、法学和通识专家余叔通，以及外语专家水天同、吴国华、陈德安、程继忠、陈妞培、陈培基、江晓明等都给予我很多指导，有些还成了忘年交。在后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时，我还经常请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等语种的专家老师帮助翻译和做文化背景方面的指导，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满足。

二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的是文史类专业，但因为招生之际教育部添加了教育专业，所以有关部门把我们一批当过老师和适合做老师的考生档案扣下了，还通过见面交流让我们确定改选教育专业。当时的招生老师跟我说，你的文史爱好在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教育系还会有更好的前景，就是以后可以攻读教育史的研究生。这句话我记下了，并在入学后就开始筹备，包括阅读相关书籍，登门拜访教育史教授陈景磐等先生。由于刚入学半年后就有研究生考试，我的好友、

画家史国良就在1978年直接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研究生班。我觉得，既然要考教育史的研究，还应该多了解教育专业，所以决定1979年再考。

1979年考上研究生之后，北师大教育系分配我跟随教育家和教育史大家毛礼锐先生做研究生。毛先生当时已74岁高龄，但思想很开明，对学生很好、很真诚，在教育系的师生中威望和口碑都很好。除了上课、读书，我经常到毛先生家请教，毛先生鼓励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教育史的薄弱环节——科技教育和民族教育上多下功夫。所以，这也成为我日后专业和研究兴趣的长期侧重。因当时百废俱兴，很多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没有教材、专著和高水平的教师，毛先生就鼓励我在校内外遍访名家，广泛地夯实研究基础，如到中国社科院跟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学史料学，跟郭朋学佛教史，跟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张立文等学中国哲学史，在西安向黄永年、贺梓诚等历史专家学隋唐史，通过王渝生（当时是数学史方向的研究生）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求教、看资料，到华东师范大学向沈灌群、张瑞璠、孙培青等教育史专家请教，在杭州大学向教育家陈学恂请教，并通过书信向国内一些专家咨询讨教，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为撰写硕士论文《唐代科技教育初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别人都以为我一帆风顺的时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却未获通过（当时有五分之三的人没通过，据说还有“比例”要求）。也许是当时刚开始授予学位，一些规定不完善，所以在讨论我的论文之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答辩委员会奇怪地由四人组成，二比二未能形成多数通过，有两名副教授不同意，两名正教授却给了较高的评价。正当我修改了论文要补答辩时，中国开始招收博士生了。毛先生建议我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博，于是我提交了两篇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并获得考试资格。考试还算顺利，毛先生在录取我的文件上也签了字，但后来不明原因地又没有通过。当我回头要补硕士论文答辩时，学校告诉我“时限已过”，没有机会也没有理由可讲了。这时我已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工作，研究重点是近现代教育史，我想能将中国古今教育史贯通学习和研究也是好事，所以并没有对学位受挫过于介意，后来想一想这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得益。

在中央教科所工作期间，我常到位于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查资料，到旁边的琉璃厂古旧书店看展览、寻旧书。中央教科所的图书馆也是北京四大图书馆之一，以教育类图书和近现代报刊为自身优势。其间，我一方面努力完成工作，同时也继续做教育史的研究，并通过各种机会向专家求教。在当时的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有一批知名的学者，如杜草甬是教材史的专家，段生农、杨焕英是比较教育史的专家，戴昊、任炎、雪祁、杨英、金铁宽是当代教育史的专家，宋恩荣是杨贤江和梁漱溟研究的专家等。在查阅档案文献的过程中，我又认识了常在北图善本部研究唐代文献的史学大家和出版家傅璇琮，向他请教研究唐史和挖掘史料的学问。而当时看到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编写的词典、教材、论文和专著等，也使我开阔了知识视野。

不久后，根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中央教科所成立了教育情报研究室，我被调入后从研究历史转向研究教育的现实和未来，开启了又一个与历史相关的、本身也是历史的拓展性研究。所谓“教育情报”就是从全世界教育的动态与趋势中挖掘和发现教育规律，这些情报既涉及各国的改革举措和实验等宏观变化，也包括教材、教法、评价、学校管理等中观或微观的改革与创新，情报来源既有各国教育界的各种文献，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教育评价协会、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各种文本。除了直接翻译和采集的“一次情报”外，视研究加工的程度还可生成二次、三次情报，这对中国教育发展很有促进作用，也为各类教育研究和决策提供了丰富与及时的信息。当时在科技和社科领域，情报学是较热门和基础的研究，而《教育情报

学简论》则是我结合工作在该领域撰写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既涉及教育类情报的特点、搜集方法、功能拓展、人员素养等一般情报学涉及的内容，也建构了情报与历史、学术的关联，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1985年，北师大又开始招收博士生，新上任的教育系主任是顾明远先生，他对毛先生等老专家很尊重，对年轻人很扶持，所以我又重拾信心，通过二次考试又回到毛先生门下读博。虽然晚了三年，但我还是很开心的。这时的北师大教育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不仅成果斐然，学习者也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无限推动力。刚入学不久，我就参加了毛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辽金元部分”的撰写，这段教育史在过往的教育史著作中几乎是空白。不久，我又参加了张鸣岐先生主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辽金元教育论著选》的编选工作，担任了整个辽金部分和元代六位学者的内容的选注工作，也为几年后出版自己的《辽金元教育史》打下了重要基础。后来的专著还得到周谷城、陈述、王梓坤等专家学者的指导、鼓励、肯定和推荐，毛先生亲为作序，周谷城先生题笈，这令我永远感念。

另一件非常受益的事是1985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者梁漱溟、张岱年、汤一介等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系列名师讲座，首次能直接聆听中外知名学者的20个讲座，并能现场求教和建立联系。当时国内的高校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的条件还较差，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大大突破已有教学科研的局限，对于从事博士阶段学习的我而言，可谓千载难逢的机遇。受此启发和影响，我还参与到民间的一些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之中，如担任了“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和“教育卷”的主编等，参加创立挂靠在中国科协科技人才交流中心之下的“教育与科普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有了这些探索、尝试和平台，我和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些同行积极开展了更多更广的教育改革探索，包括翻译国外教育名著和重要的文教类工具书，选编国情和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献，集合当时的知名学者撰（编、译）写《中华文明史》《中国大书典》《中国国情大辞典》《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20世纪教育名著译丛》等重要和大型的专著或工具书，支持一些教育名家和中青年学者出版专著、教材，开展教学实验，举办文教科普类的学术活动等，在人文社科领域有不少先行探索。有一些较我年长的学者，至今还常开玩笑，说是读了我们推出或介绍的经典，才开始进入专业研究的。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毛先生的指导下选定做隋唐五代教育思想研究的，为此我下了超越常规的功夫。除了论文正文以外，我还做了有史料价值的人物传和教科文大事年表，使原先比较薄弱的隋唐学术史、教育史研究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并从总体上把握和通史上观照，对这一段历史首次提出了“前理学”的概念。对此，张岱年先生在为本论文写的序中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评价。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拜访了一批全国知名学者，如唐长孺、韩国磐、张岱年、张中行、陶愚川、吴福恒、张岂之、沈善洪、卿希泰、冯天瑜、张立文、邱汉生、杨荣春、马秋帆、黄济、程舜英、牟钟鉴、王世舜、李国钧、熊明安、郭齐家等，在学识、研究方法和做人等方面都得到他们的帮助。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求学之路很顺利，前文说了，其实暗礁重重。也有人嘲笑我：“除了博士学位，前边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学历（高中没上，本科肄业，硕士没学位）。”但我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只指向“止于至善”而不以标签名头为意的影响，且还有陈寅恪、梁漱溟、钱穆、钱锺书、金克木等大师为榜样。

三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又回到中央教科所工作，并陆续经历了教育情报、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含高等、职业和终身教育）、教育理论等多个研究室（中心），对于教育及相关研究的了解和感悟都有了进步。随后我担任了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参加了多个部委级和国家

级项目，参与了“人才学”、“教育商品化”、普及义务教育、教育安全、三教（农科教）统筹、加入世贸组织、教育实验区（特区）、教师工资待遇、中长期规划、地方教育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高等教育专业改革及后勤社会化、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侧重经史、科技、民族和儒家传统）等一系列重要主题的调研和专题研究，并在2002年主编了《中国教育问题报告：入世背景下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与基本对策》，提出“教育安全”“主动和参与式督导”“职业教育四支柱说”“民办教育的价值在优化教育生态”等概念和思想，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教育、财政、安全等有关领域专家的重视。

还值得提到的是，1992—1998年，我曾与博士同学毕诚等北师大、首师大的同道创办了私立华诚学校（中小学），担任校长，自主创造条件体验和实验真实的教育，并推进了民办教育立法及后续完善。我一直认为，学教育专业的人，就应该做与真实教育有关的事。在那一时期，我们进行了“十年一贯制”“文理科融合”“校本教材（语文、外语等）”“多种课堂（常规、环境、自主、研学一体）”等实验，并较早增开了计算机、工艺美术、说文解字、英语口语、生活等课程，还帮助一批教学及管理人员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与家长委员会的真诚交流中获得支持，在与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真诚交流中得到理解和信任。我们不仅与国内教育界、学术界的交流十分频繁，与境外的合作也多有成效。有了当校长、主任和教师的经历，也使我的研究立场、范式和价值取向有所改变，不只醉心于玄谈虚论，更在意对教育进行真实可行的改进，也更知道应尊重教师、学生、家长的诉求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

中央教科所，即今天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我在此工作了整整30年，了解这一机构有不同于高校的“顶天立地（为教育部决策服务，同时为各地各类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和科研服务）”等独特功能，并因此得到多方面的锻炼与培养，包括参与教育部的各类教育专题研究，举办教育界的各类高层学术活动，为相关司局提供国内外最新教育动态和主要观点，参与高校评估和国内的国际学校认证，也由此引发了不少对现实有价值的各类专题研究。我任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时，举办了与经合组织合作的高规格的高等教育改革峰会，不仅国际专家来得多，也第一次涉及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深刻话题，如对中国书院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校如何看待融入世界和借鉴国际标准等问题。大约在五六年后，中国出现“书院复兴”的现象，与当时的研讨有一定关联。此后，我利用各种机会推进书院研究和复兴，从历史及学术拓展至促进当下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变革。

四

在我的教育研究历程中，曾有一个常常冒出的奢望，就是想在教育的各主要领域都能有较深切的体验，到高校当老师便是这个奢望的最后一环。机会在2011年来了，起初我准备调入北京大学的教育学院，后来因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正在组建教育学院，不仅手续简单，而且“人民”的名头更契合我的理想，所以便申请离开了中央教科所。在高校开课既要有自己的专业优势，又要符合学生的需求特点。为此，我做了认真的筹划，开设了四门效果还不错的新课：“教育的历史与哲学基础”，主要针对跨专业（涉及近20个专业）学教育的研究生，让他们能较深入全面地认识比较复杂的教育问题；“教育调查与实验”，为了让研究生了解教育是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应有调查和实验的基本素养；“中国书道”，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艺术类通识课，内容包括文字、文化艺术史、书学研究和创作等，书画艺术专业的学生也很喜欢；“中国大学史”，属于中外大学史课的中国部分，不仅提供中外大学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本科生了解什么是“大学”和“高等教育”，因为据了解，至今很多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一直延续高中的学习方法，学习的效率非常低。

这四门课都兼具知识、方法、转变观念、开阔思路、联系实际、提升综合素养等功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实验、教育调查、书法等课。课上允许学生随时提问题、争论、上讲台谈想法、合作研究；没有现成或固定的教材，仅有两三万字的课程纲要和随时补充的相关信息及参考书目。其间，我曾建议要缩短讲课时间，让学生有至少三分之一学期的时间进行自主阅读、调查、创作和撰写小论文。其目标后来虽没能全部实现，但教学效果十分理想，不少学生写的小论文都达到可发表的水平，学生评课满意度为98.5%。

除了教学之外，我还担任了一届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以及教育调查和实验中心主任、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等，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专家。在校外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学校文化研究会和中国书院协会副会长、什刹海书院与敬德书院副院长、儒学教育研究会顾问、西部阳光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并在北外、首师大等高校为硕博士研究生开设“历史素养”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为多层面的学校与教师发展和科研提供指导，还明确提出了教育者“职业素养”和“专业素养”需要并进互促的原则和策略。

在研究方面，我继续坚持教育史的老本行，在“书院学”“科技教育”“民族教育”断代教育史、传统文化回归现代教育、五四运动影响反思、西南联大价值评议、书院复兴实验等方面多有用力。同时，在促进现实教育改革方面，持续关注职业教育立法改善、中国的“学校法”制定、学前教育的政府角色变化及防止“小学化”的策略、对高校排名与评估的评议、大学生自主发展等方面，通过认真思考提供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重要观点。如我在2006年即提出过高校教育评估和国际排行的问题，并建议设立中国自己的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指标，以用于高校自评和社会评价的依据，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80周年之际提出各国高校评估不宜使用一个标准，尤其在人文、教育和艺术等领域，应有自己独立的标准，而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与世界的接轨不应中断。再比如，学界都强调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要看大楼，还要看大师，我觉得这还不够全面，未触及最根本的问题。为此，我明确提出，还需要有“大”学生。鉴于高校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强调学习者也要有责任和使命意识，要“会学习”并使自己终身受益。与之相应的是，强调大学生的学习是“成人学习”，应充分利用新知识技术的优势与中国丰富的学习经验，将学习潜力更好地挖掘出来。作为高校，则应下功夫提供真诚负责的引导和扶持，并建议中外大学史、成人学习方法等应成为大学的“必修课”。为了产生实质性的推进，我还主编了高校教材《大学体育与健康》《大学书法教程》等，将上述思想贯彻到具体的教材编写和学法改善的实践之中。

在推进基础教育发展方面，我通过研究、考察和参与实验，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认识。第一，解决中国教育公平和相对均衡的关键，就是要制定“学校法”，重点学校的“特权”问题不仅多次被政府批评，且有对整个教育的诸多不良影响，这一问题不根本改变，许多改变都有“饮鸩止渴”的问题。第二，全面发展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仅有10%的“三好学生”，说明我们的教育存在严重问题；全面发展不是“全面平庸”，每个学生均有对应的智能类型，并能通过教育迁移和发展。第三，乡村教育可有乡村的特色和优势（场地宽裕、贴近自然、保留更多传统），但标准不能低。第四，大学和高中教育都可以“零起点”，所以不必过于看重中高考分数，通过相关实验（亲自参与支持北京市第105中学的语文和作文实验，后带动十所学校跟进）证明“薄弱校”和所谓“后进生”改善方法有很多，效果明显。第五，课程教学思想和方法需要改善，专设课、环境课（校园和墙上的知识）、图书馆课（学会阅读）、合作项目课（任务学习、研讨总结、轮流发言）、渗透课（美育、德育、传统文化等内容更适合）等可交替使用，没有一种课是“最好”或一成不变的。第六，学生学习和教师发展最好的“减负”提效方式就是“合作学习（科研）”，体育运动中的团队合作方式值得

借鉴。第七，面对中高考带来的各种压力，学校教育更需要改革，一线的好经验也很多，需要研究推广。第八，学校特色的形成，不是找到特别的概念，而是要在坚守教育方针原则的基础上，做好因校（包括因师、因生、因地、因传统等）制宜的努力。第九，“成功（考试、升学）研究”有误导，各类特殊原因不应成为效法的榜样；而教育或学习“失败”的研究更有价值，更有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是帮助所有学生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十，劳动教育不能模式化，应与生活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结合，并提出“职业素养”应是劳动教育和国民素养的重要内容，在普职分离前后对每个学生都有职业素养教育的问题，并应有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五

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我还一直坚持书法和篆刻等方面的爱好，一晃也有 50 多年了。早期是因为兴趣所致，后来知道科研基本依靠逻辑思维，艺术创作须借助形象思维，兼顾得好可以相得益彰，也可有积极的休息及意想不到的另类成果。有幸的是，我初学时即常可访求名家，当时虽条件较差，但下过因没书而抄书等笨功夫，是可以更好地受益的。我体会，学艺术和治学有共通之处，只有某种熟练的技艺而没有自主和创新意识也难成大器。为此，在艺术探索方面，我并不恪守一技，而是尽可能开阔眼界、多方尝试，努力进入“学无常师”的“游于艺”的理想、自由状态，艺术的探索切不可过于功利，其生命和价值取决于人的精神追求。

在提升艺术素养方面，我的书法曾受教于启蒙恩师、上海书法家叶希豪先生，并通过她得到陈叔亮、潘学固等先生的思想和创作经验；后来又得到魏启学、启功、刘汉春、夏午樵等先生的指导，他们的指点已是“书学”层面的传授。在篆刻上，我早年受到表哥章建平的影响，他曾是西泠印社复建时的功臣，在京剧、木工、石雕、篆刻、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成就，有“小白石”的雅号；另一位是北京篆刻名家金禹民的弟子张石莽，其作品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日本展出。他们各自的风格代表了中国南北篆刻界的特点，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不同的创作理念、思路和特色。我的绘画早年曾得到画家韦启美的指点。在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学习时，华开进等一批很好的美术老师都是很棒的画家，我常到美术教研室看画，也常向他们请教。很可贵的是，我与当时美术班的同学史国良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也可随时求教，得到他多方面的指点。在具体绘画技能上，我曾通过函授跟随上海画家陆敏学习过工笔重彩人物，在中央教科所美术教育专家刘万岑的鼓励下尝试油画和粉笔画等。到了 60 岁以后，偶尔受学生的鼓动和影响，我又开始尝试学习和创作浮雕，主要是“掌上雕塑——大铜章”，在学习和尝试创作的过程中，我不仅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同道同好，还加深了对绘画、雕塑关联的理解。显然，我在艺术的专业技能上有不少欠缺和不足，但这些经历让我在艺术的感觉、体验和尝试上获益颇多，也在不少方面促进了我的学习和研究。

为了提升自己的艺术和审美素养，我不仅尝试撰写了《中国书道》（讲课时曾用“书学钩沉”之名）等专著，还应邀撰写过书法、绘画、刺绣、篆刻以及艺术类书籍的评论，主编过《简明艺术辞典》（是《学生艺术百科辞典》的增订版），参与艺术类课改实验，在学习体验中，逐渐提升自己的相关素养，也为逐渐成形的美育研究积累了较丰富的素材与重要支撑。

由于我坚持了对艺术的爱好，所以在艺术教育乃至美育的探索方面也有心得和尝试，不仅在主管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期间支持了幼儿美术教学的实验，还在其过程中发现“不怕”是学习最重要的心理基础，并可向所有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迁移。根据中国书画教育的传统，我发现描摹的过程非常重要和有效，并可用现代教学论、心理学等佐证。基于这一发现和认识，我在 1995 年前后就陆续推出“历代名帖速成习字系列”（俗称“一百天”系列，共 18 种，是放大、改良、强化的新“红模

字”），依据的是学习规律和传统经验。这套训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某种书体的学习效率，减轻了各类学习者的负担（中小学生和老龄书法学习者均反映良好，个别书体的训练还得到专业书家的肯定），也使传统文化的回归、教师素养的提升等工作更加有效。

和艺术专业出身的专家和创作者相比，我的爱好都属于业余。好在这种状态比较纯粹、不为各种“五斗米”所累，所以能够比较自由、放松，没有框框，很符合艺术创作的心理学需求。画家史国良曾为我的一本速写集《梵天净土：走进西藏通天之路》写序说，非职业艺术家的创作，可能为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另辟蹊径”。以艺助道、以艺养心也确是我学习各类艺术的重要目的之一。尽管有时候我的同事常看重我的艺术探索，而忽略我的学术研究，令我有些尴尬，但从总体上我还是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能深切地感受到，学术和艺术是相得益彰的，在工作、生活进入疲惫和停顿之时，用学艺和创作调整是最适宜和开心的方式。2024年《赤子》杂志的副主编李朝阳写了一篇对我的专访《五星堆：程方平学术及书画印章艺术》，肯定了我的一些成绩，也使我在退休之后能以此为鉴，寻求继往开来的新路。

六

谈到以往求学教学治学的感悟，我认为，正向的历史和人生变化都基于正确的学习和选择。要想使自己发展行稳致远、不愧人生，就必须做志存高远和止于至善的不懈努力。而学习和研究教育的最大收获就在于能“学会学习”。当然，最需要“学会”的不仅是读书、写论文，还应该有意识地学好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在学习中，既要有追慕先贤、确立志向、研读经典的努力，也要有求知问学的兴趣和渴望。记得在上研究生时听几位老先生聊治学经验，说正确的学习提升过程是：博（基础、通识）—约（专业）—博（以几个专业为支撑提高基础）—约（有多个专业作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反复递进过程，我很受启发，并以此指导我日后的学习与研究历程。我从中师学语文，后来兼学历史、文字、逻辑、书法，知道文史政要打通，到大学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哲学、教育学、实证和比较研究方法，视野渐宽。经过博士生训练和后来的专业研究，我又明白知行要并进，理论须通过实践检验，科学方法仅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还要有哲学、经验等方法做参照和补充。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教育与社会发展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还看到了传统的价值，并对地方、民族、本国、外国的知识和思想有了更多关注，有意识地努力探究其各自的贡献与影响，而不是依赖专家、权威，用迷信方法对待“科学”。

在治学上，我坚持有规划、有耐心、有自主、有底线、有观照的原则。所谓规划，就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安排研究进程，有些课要补，有些基础要夯实，制订个人发展规划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正视自己的优点和缺欠。根据规划的方向与原则，可以在研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比较擅长的研究和探索。所谓耐心，是指有价值的科研不能急功近利、追风赶潮。作为教育史的研究者，我是在60岁前后才写了第一本关于孔子的书。集腋成裘的功夫是研究者最须看重的。我的一些研究项目已历经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觉得不成熟就放一放，一直做补充和挖掘的努力，知道“人不知而不愠”的好处。所谓自主，就是指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既要有“当仁不让”（孔子语）、“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隋王通语）的质疑和求真精神，也要有“只我是，无我非”（明吕坤语）的胆识和自信。为了防止就教育谈教育、就问题谈问题的局限，我曾要求自己，并为年轻研究者提供了仅有六本书的“基础书目（纲要、坐标）”，包括中外哲学史、文学史和科技史，目的是以此为基础，便可自主判断人类出现至今所有探索者贡献的作用、定位与价值，不必事事都遵从时髦或权威的见解。所谓底线，就是对学问要有真诚和敬畏，对言行要有责任和担当。遵

守学术方面的道德规范，不仅对自己的学术生命负责，更要坚守科研的基本规范。我曾撰文谈及学风、文风、反剽窃抄袭等问题，还在工作中尽量避免占用公共资源为自己服务。在中央教科所工作30年，我没有利用权力在其下属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自己的专著，挣得相应的名誉。即便在我做负责人的民间研究所和民办学校也是如此。所谓观照，就是要顾忌自己研究的影响，不能违背学术良心和规范。对于已经发表的著述，经过一段时日，还需要反省自问，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做必要的补充修订。要对现实改革和未来长远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学术支持，而非谋求名利。中国的研究不能只满足沦为某一时髦理论的“印证”或注脚。作为中国人和中国的学者，学明白中国字和中国文化是本分，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是为己、为民、为国、为人类有所作为。中国的学习、成长和发展智慧非常丰富和奇妙，有效地掌握和运用，能让人实现多方面的超越。这在历史上有不少案例和经验可做借鉴。

总之，对学习和探究的热爱是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此也更容易超越和创新，而不至于因夹杂私念而使探索游离初心和本质，让学习和学问都能尽可能地有益于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的感受是：学海有一条航线是属于自己选择的，沿途的风景就是属于你的精彩和成就，尽管航行的过程中有雷雨风浪，但都不足虑，反而是可以开心讲述的故事。

(责任编辑 曹周天)

Find Joy in Overcoming Difficulty and Grow Daily in Scholarship: My Journey and Reflection on Studying and Academic Pursuit

Cheng Fangpi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scholarship lies in the organic unity of planning guidance, academic patience, independent judgement, bottom-line awareness and realistic observ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guidance, it emphasizes formulating research paths based on individual endowment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selectively delving deeply into areas of expertise. In terms of academic patience, it advocates not to seek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follow the trend blindly, but to accumulate small efforts to make solid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judgement, one should possess the spirit of questioning without hesitation and the academic boldness of “only I am right and nothing is wrong”, and not blindly follow authority or fashion. In terms of bottom-line awareness, one should hold a sincere and reverent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adhere to academic norms, and not use public power for personal gain. In terms of realistic observation, on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impact of research, not violate academic conscience, and provide benefici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academic path of scholarship should follow the progressive rule of “broad, concise and broad”, laying a foundation in general knowledge, then specializing in one field, and finally expanding academic vision with the support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As Chinese scholars,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eeply comprehend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make achievements for oneself, the people, the country and humanity.

Key words: experience of scholarship; academic independenc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road and progressive